

扬州梅岭中学校长中南海提建议

他在总理面前“失控”2分钟



王力耕在座谈会上发言 图片由本人提供

总理:不怕说得重

座谈会代表们刚刚坐定,总理就走了进来,这时9点不到。“总理没有急着落座,而是绕场一周和10位来自科教文卫各界的代表一一握手,看起来更像一位儒雅的长者。”王力耕的座位被安排在紧靠总理的右手。“总理好!”王力耕只记得自己当时就说了三个字。总理回答:“大家好!”

“我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样的物品:一个装有红、蓝笔和纸的文具盒、一张发言顺序安排表,还有一张提醒大家把发言时间控制在12分钟内的小纸条。”看到这纸条,王力耕不免有些紧张。身为教师,他甚至不用看表,就能准确感知和掌控时间,从来不会超时,准备的2000多字发言稿也计算过,12分钟差不多,可在总理面前会不会因为紧张而超时?

9点,会议正式开始。“大家都知道总理亲和,但比我们想像的还要亲和。他说了开场白,大家就不紧张了。”王力耕清楚地记得,当时总理说:请大家说,不怕提意见,不怕说得重。大家一下子放松了下来。“所以好多代表说了自己的心里话,不读稿子了。会场的氛围后来是很轻松很活泼的。”王力耕当时也放下心来。

超时2分钟

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第一个发言后,第二个就

是王力耕发言,他想向施一公借表,但两人的位置是相对的,没办法借。“我只好开始讲,越讲越激动,把内容都说完了,才感觉自己似乎是超时了。”讲完抬起头,王力耕才发现,原来会场四角都有电子钟,只要抬头看一看就能知道确切的时间,不过由于太激动,他当时根本没发现有钟。

后来王力耕留意到,每位代表都超时了,不过总理并没有责怪大家,反而让大家都把话说完。最后原定在11点就能结束的会议,一直延迟到12点20分才结束。“会后施一公教授告诉我,他讲了15分钟,我差不多讲了14分钟,果然超时了!”王力耕说,自己不是紧张,而是太激动了,这是自己难得的一回“失控”,而且现场所有人都“失控”了。

向总理提出三点建议

王力耕发言的主题是素质教育。王力耕一直工作在基础教育第一线,把一所城乡接合部的普通初中办成是一所公认的优质素质教育学校,所以才有代表江苏教育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机会。1月23日接到省里的通知要到北京参加座谈会,但直到了北京,他才知道自己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与总理座谈的机会。

1月25日,就在座谈会的前一天,王力耕把《政府工作报告(征求意见稿)》读了又读。一直

到1月26日凌晨才写出了2000多字的发言稿。

王力耕说,怎样化解“学生过重课业负担”难题,《报告》中提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,切中时弊。但创新精神的培养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。目前,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,整天忙于作业,无暇思考,何谈创新精神培养?为什么负担过重?除了东方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之外,层层级把升学率作为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,也是加重学生负担的直接原因。如何化解,他在会上向总理提了三点建议:一是体制上,公、民办要错位发展。二是管理上,教育管理要专业化。教育管理干部要从行政体制里分离出来,恢复其专业性特点,真正实现“教育家办教育”,进而实现“教育家办教育”。三是评价上,大力提倡素质教育。

他还特别提到了评价观的问题:学校办得怎么样,要看学生培养。看学生培养要问三问:学生在获得高分的同时,是否愉快?学习过程愉快,才能“剩下来”成为素质;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以后,是否具有潜力?潜力,就是学习力,终身教育的社会需要学习力。学生毕业以后,是否眷恋母校?学校教育,让学生带走的不仅是分数、成绩,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带走一颗感恩之心,而不是怨恨“撕书,砸锅,骂老师”,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。

快报记者 黄艳

特别记忆

总理赞江苏教育

“14分钟里,有三次与总理的对话。”王力耕说,总理是会议的主持人,由他来介绍发言人。当总理说到下一位发言者来自江苏时,总理说:江苏是教育大省,全国教育看江苏,江苏教育搞得很好!这话说得王力耕心里非常温暖。接下来,他自我介绍叫王力耕,是江苏省扬州市梅岭中学校长。总理又关切地问梅岭中学因何得名?王力耕回答:因地得名。学校所处的地方就叫做梅岭。第三次对话是在王力耕发言中间,当时他讲到建议政府加大对教育投入,他也不知道政府很困难,有钱办教育是善举,没钱照样办教育是胆识,是明智之举。“可能是因为我讲话带口音,总理又反过来问了一句,什么善举,我又重复了一遍。”王力耕看到,在他发言期间,总理一直都在认真地听着、记着。“总理是教育的内行,他非常了解教育。”

意见可被吸纳

1月26日12点20分,发言结束。温家宝总理说:今天每个人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。当时,会场里还坐着一些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,总理对他们说,要尽可能考虑和吸纳大家的意见。快报记者 黄艳

今日视点

总理“大学功利论”值得教育部门反思

在与科教文卫代表座谈时,温家宝总理对当前的中国大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感慨道:“一些大学功利化,什么都和钱挂钩?这是个要命的问题。”在提到中国大学管理一刀切遏制创造力这一问题时,温总理也说出了自己的思考:“一所好的大学,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,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,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。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。”2月2日的《新华网》在报道这番精彩对话时做了一个同样精彩的标题《温家宝:大学功利化是要命问题,须有办学自主权》,一针见血,余音不绝。

温总理的这番话,很实在,更有极强的针对性。当前的大学,“功利

化倾向严重”和“办学自主权不足”的确是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钱学森的疑问“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一流大师”,与诺贝尔奖一年一年与我国高校无缘的尴尬,去年曾经引起学界对大学教育的新一轮反思,但这样的反思,毕竟很难成为政策层面的推动力,现在总理也直接指出了“大学功利化”和“办学自主权不足”这两个问题,相信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变革,恐怕已经不远了。那些沉迷在高等教育现状中不能自拔的既得利益者,真的应该多听听总理这番话的弦外之音,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多做准备。毕竟,变革越晚来临,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。国际上权威的《科学》杂志《柳叶刀》和《自然》已经先后发文质疑中国的

学术诚信,中国大学变革的迫切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“大学功利化”的恶果,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:学术造假成风、师生关系淡漠、大学盲目扩招然后卖地还债、培养质量严重下降……在这些恶果当中,我始终觉得,有关部门一些不当决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。比如说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扩招,就是以“拉动内需”的目的推行的,大学招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拉动内需,这种目的上的错位,必然带来今天“本科生还不如过去专科生”等一系列恶果。想要让大学从多年扩招的巨大惯性中走出来,有关部门就必须对当年的扩招政策失误作出深刻反省,并尽快让现在的大学招生纳

入“教育为本”的正确轨道。

如果说“大学功利化”是果的话,那么,“办学自主权不足”就是因。虽然教授治校是人们一致认为最合理的高校治理模式,但目前的大学,总体上来说仍然是“官员治校”,无缝不入的官本位思想,早就侵入了高等教育的各个角落。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,追求权力必然成为很多高校教师的“最优选择”,学术研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,即便有,也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。看看现在的很多教授,不是想着升官就是忙着走穴,怎能寄希望于他们践行“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”的大学精神?在温总理直指高等教育弊端之后,高校管理能够去行政化吗?这是个并不奢侈的期待。(本报评论员 赵勇)

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

步行街无关民生只关“财政拼命花钱”



郑州要求每个区建一条夜市步行街,口号是“培育消费”,但恐怕骨子里还是为GDP服务的。它无关民生,只关于财政拼命花钱,以营造虚假的繁荣和可笑的政绩,并想着从中央刺激消费的投入里多分一杯羹。

郑州市市长赵建才称:今年郑州GDP要增长13%;市内每个区都要规划建设一条夜市步行街,以培育夜间消费。

GDP增长13%是否容易实现,我们当然无法预知,但如果将郑州计划实施的各项举措结合起来,想必结果是值得乐观的。我之所以将大建步行街与GDP增长指标结合起来看,就是觉得这两者有着某种神秘联系。

中国人不敢消费,是一个世界性共识。政府斥巨资如果不是用来改善并不富裕的民生,而是用于诱使居民消费,其本身就是矛盾的。这时,我不禁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:政府说,再坚固的口袋我也有办法打开;而市民则说,再锋利的刺激措施也没办法让我拿出钱来。其实政府的钱也是市民的钱,所以消费刺激计划就仿佛是拿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了。

不否认“各区至少建一个步行街”是郑州决策者深思熟虑的结果,但显而易见,这个设想没有考虑到当地市民的意见,似乎也没有借鉴一些城市步行街失败的经验。从网民们的反应来看,人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这样的建设。以市场眼光来看,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意愿,才是该不该建步行街或建多少步行街的前提。而居民消费意愿如何体现?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供参考:一是市民腰包够不够鼓;二是社会保障不够完善,敢不敢花钱。这两点,从郑州市民对政府刺激消费的决策反应来看,并不乐观。我甚至认为,在居民收入不高、社会保障落后的背景下,诱使他们大量花钱是极其错误的。

印象中,广州与上海的步行

街全国闻名。相较于广州、上海,郑州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都相差悬殊,广州与上海的步行街也不过一两条而已,远不像郑州所规划的那样多。尤其值得郑州决策者引以为戒的是,东莞、荆州近年来大建步行街,结果建起来后门可罗雀,完全成了摆设。

综上所述,我觉得郑州大建夜市步行街的规划,似乎并不是冲着消费来的。就像我上面所联想的那样,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规划,倒更像是为了完成GDP或其他的目的而作出的。吊诡的是,不管效果如何,财政拼命花钱,早已不是郑州的发明,这在中央投资刺激消费的当下,真是怪事一桩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热点纵论

李庄当庭认罪 重创律师声望

昨天上午,李庄涉嫌伪证案在重庆二审开庭。开庭不久,李庄当庭承认作伪证,并向法庭称:“一审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充分,我撤回上诉理由,我先前的上诉理由作废。”

一贯态度强硬的李庄会在二审法庭上当庭认罪,恐怕谁也不会想到。

李庄对二审结果极度绝望吗?从二审开庭的情况看,李庄不该产生这样的情绪。因为在二审中,李庄及其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的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,基本上得到了满足。

看来李庄当庭认罪就只能属于第二种可能了,即之前确有诱导或指使案刚模作伪证的行为。二审法庭有力地纠正了一审程序中的不足,李庄却软下来了,这充分说明他没被冤枉。

李庄的当庭认罪并主动撤回上诉,有力地回击了重庆打黑“打压律师”的质疑。同时,笔者也认为,李庄的当庭认罪将重创律师的整体声望。人们不会忘记,李庄造假案发生之初,顿时在全国律师界掀起一股声援李庄的热潮,毫无根据、先入为主地质疑重庆司法机关的公正性,好像李庄就是被冤枉的,是因为替黑社会头目辩护才“引火烧身”的,是重庆司法机关故意给律师辩护障碍,甚至公然呼吁修改刑法,删除律师伪证罪条款。不知道当初曾经力挺李庄、武断认为李庄无罪的律师们,面对李庄的当庭认罪有何感想?或许律师个人丢脸不足挂齿,但这些律师的无原则的冲动表现却让公众看到整个律师队伍的问题,给公众留下“律师在触动自身利益时也不理性”“律师为了金钱也出卖法律”的印象,极大地伤害了律师在社会中的信誉。

看来,李庄案应该让中国的律师界进行认真全面的反思,不要一遇问题就抱怨“生存环境太艰难”,其实这是一些律师出卖法律、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借口而已。

(李克杰 法学副教授)